

# 思辨体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

□胡 平

杨黎光曾获三届鲁迅文学奖,是一个纪录。现在他写得更为自由洒脱开放,完全致力于创新和理想,拿出的作品也更为大气,《大国商帮》即为明证。

从《中山路》到《大国商帮》,他开辟了新的“思辨体”报告文学创作道路,作品通篇充满思辨,呈现出全新的文体面貌。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体对他过去的写作有所叛逆,不再那么看重形象的铺陈,可谓中年变法。

他当年的成名作《没有家园的灵魂》里第一句话是“薄薄的一张信纸,寥寥27个字。一封举报信引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受贿案”——这是由形象进入的,通篇不离具体的写照。而《大国商帮》的第一句话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海洋的力量。所以,‘沿海’这个词在当下语境里意味着开放、先进与繁荣”——这是由思想进入的,并不大诉诸感官。读者仔细读,会意识到这两句话里已经寄托了作者对“海”的许多感受。

现在许多报告文学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思想,弄得它们与长篇报道不分彼此。杨黎光当然是善于驾驭形象的,早期作品在描写上堪称典范,已经玩熟。至于思想性,对于有些作者来说,似乎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只能靠采访填充内容。在这当口,杨黎光开始力推思辨文学,是一种对潮流的反拨,与庸俗报告文学分清了泾渭。

这种界限不是在作品中有多少议论——议论是轻易的,许多作品也在大量堆积事例后谈论

着作者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不过是重复着现成的论断。《大国商帮》并非如此,从通篇立意到局部阐述,它都在说别人不曾说过的话。杨黎光属于写不出自己的思想就不写的作家,从早年写王建业开始就是如此。有些报告文学作家只写由甲方确定的题材,由此保障采访条件和经济收益,当然,同时也需承诺去说别人的话。杨黎光则很少接受这样的写作任务,他首先要保障的是思想的自由。因此,思辨体首先是自由的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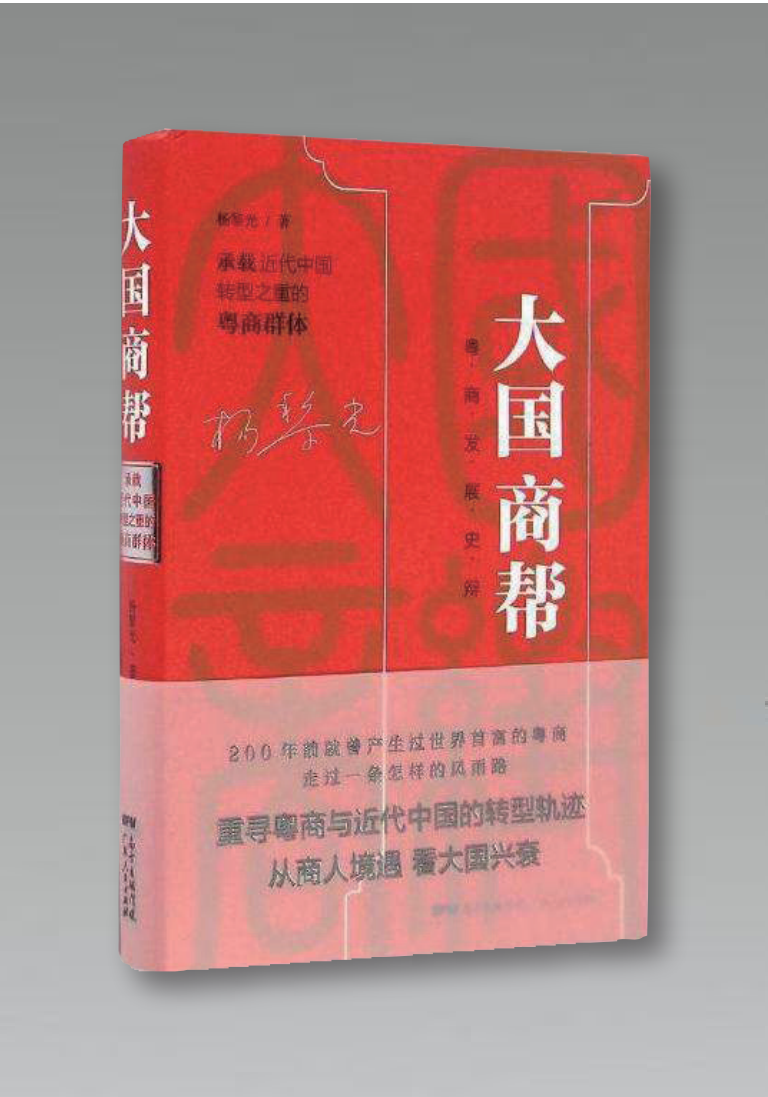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写商帮的作品,而一地商帮与大国命运的联系,是作者独特的发现,也是他写作的理由。在他之前,人们并没有真切认识到粤商曾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读过此书,人们如果明白了为何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必定在广东;孙中山的背后,若没有众多商人为后盾,他便不可能支撑,杨黎光就没有白写。

除宏观史辨外,《大国商帮》每章每节都洋溢着作者沉静的思考和设想。如他认为粤商是“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辛亥革命是“商人的革命”,粤商与晋商、徽商之间有质性的差别,买办开创了粤商新时代等,都给人带来深刻启示。有些段落显示着作者的睿智,如他分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语,认为此语恰好表明,长时期里国人的确认为领土只包括土地,不包括海洋,而这种意识最终导致了近代史上中国的落后挨打。这种分析,不仅有独到之处,而且颇有趣味,显示了作家不俗的眼光。

思辨体只是报告文学的一种,但思想性却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品都需要的,是区别作家高下的重要标志。粤商这个题材,杨黎光来写,与别人来写,差别上最终不在史实的详略、材料的多寡,将更在于穿透的深浅。书中,作者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朱元璋实行海禁是必然的,因为朱元璋本人就是农民;由农民统治的国度,不可能自觉走向现代化。这种判断就是很有概括力的。很多年后,中国也曾有过“工农兵学商”的时代,把商人放逐末端,于是再次导致闭关自守,究其原委,也同样是农民世界观发生作用。《大国商帮》中灌注了杨黎光的大量思想成果,它们宝贵,也是作品的精华。更可贵的,是作者对待报告文学的态度,他是把创作当作一件经世致用的事业在做。

除去史辨,此书在对史实的发掘上也是有成绩的。作者写作中研读的参考书目有67种之多,考察和吸收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书中有些珍贵的历史细节,则是作者从浩瀚史料中打捞出来的,如关于十三行的沿革、关于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的诞生、关于中国第一个女营业员的生平等等,经他考证后记入此书,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也带来了学术价值。

杨黎光不是广东人,乃90年代广东引进的安徽作家。他能够在广东深深扎下根去,逐渐关注广东题材,实现创作上的转型,写出从《中山路》到《大国商帮》等优秀本土作品,是做得很成功的,成为客籍作家的典范。他的适应性来得并不偶然,也与他的创作深度相关。



“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是杨黎光写作报告文学《大国商帮》——连同较前的两部作品《中山路》和《横琴》——的明确宗旨,这就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远大的抱负,一幅宏阔的视野。以2000年时间跨度为背景,作品对作为一个群体的广东商人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命运的关系,尤其是粤商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进行了详尽的铺陈,深入的揭示,观点的表达颇具说服力。

丰富而扎实的文献价值,当是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也奠定了作者建构自己的理念大厦的基础。从秦始皇平定天下统一六国后南征北越开始,作者清晰扼要地梳理了岭南地区的历史沿革,以大量生动的资料介绍了其开放精神、重商传统的形成。受崇山峻岭的阻隔,据山海之险、得山海之利的地理环境,秦汉时代海外贸易的兴起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但使岭南大地经济社会生活的形态与内地相异,更孕育了一种有别于中原内陆的精神气质。粤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和发育,他们不仅是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结果。作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得风气之先,具有强烈的开拓、创新、进取意识,“乐于面对蓝色海洋、勇于改变陈旧世界的文化血脉”。

这些描述,仿佛是一张油画浓重的底色,映衬出了其后2000年间的历史舞台上粤商活跃的身影,以及他们的商业贸易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作为中西方贸易交流的桥梁,粤商群体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每个关节点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传统的古老社会,他们的活动空间又是有限的,行动明显受到官方政策的掣肘,社会政治形态决定了他们的生存面貌。特别是全球化浪潮肇始之时,欧洲人向海外大力扩张,而清朝统治者却实施闭关锁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粤商作为当时跨越政商、沟通中外的特殊角色,小心翼翼地游走于官府和洋人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艰难中生长。

《大国商帮》有一个副标题: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从商人境遇,看大国兴衰”,是贯穿整部作品的叙事主线,而在鸦片战争前后,两者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表现得尤其突出。鸦片战争是中国以惨痛的方式步入近代史的标志,不同角度的研究文章早已是车载斗量,但对一个重要的方面却仍嫌关注不够,即当时两国经济形态和商业观念的悬殊,以及商人境遇的截然不同,是导致这场战争爆发和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本书从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对待商人、商业的角度来加以阐释,自有其独出机杼之处,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容易令人信服:“一边是近代商业文明的杰出代表,以贸易扩张为立国之本,为保护商人的财产不惜劳师远征;一边是失去了社会活力的老旧帝国,视贸易为对蛮夷外邦的恩赐和皇家的专享财源,把商人当作可以肆意欺凌的贱民。中英两国商人的不同境遇,标记了两种文明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运的兴衰。”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原来的广

州十三行行商变身为广东买办,粤商新时代在上海开启。天朝衰败、虎狼环伺的严酷现实,直接促成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兴起。粤商凭借其专长、资金和才干,在洋务运动中实际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他们在思想启蒙、国民教育、文化更新等方面都多有拓展和建树。深度参与社会变革,这正是他们与传统的晋商、徽商等商人群体的不同之处。他们由逐利商人变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致力于将传统中国融入世界潮流,追求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实现现代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创作这样主题重大、题材时空阔大的作品,十分要紧的一点,是需要把握好宏观与具体、思想和史实的关系。既要有多宏大的整体格局,又要避免陷入空疏浮泛。“理”总是寄寓于“事”中,要做到以事证史,理念要在史实中得到验证,史实也要能够反映折射出历史的某种本质属性。在这一点上,《大国商帮》显示出了其学风扎实、针脚细密的一面。如前面谈到鸦片战争的起因及结果与中英两国对待商人的不同态度关系密切,围绕这一点,作品以详细的资料,描述了在清政府和“夷商”的双重夹击下,特别是官府的索取无度、苛捐杂税繁多,导致不少广州十三行行商的破产,不少人甚至被流放伊犁,他们的财产甚至生命都缺少制度保障。所举例证都是具体的人和事,来源于故宫中的档案文书,以及当时在华外商的文字记载。而战争的得胜方英国,早

在13世纪初,就通过《大宪章》确立了英国国民拥有不容侵犯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些具体的个案,无可辩驳地反映了当时清王朝专制体制的致命弊端,揭示出观念的落后、制度的缺失,正是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大清帝国日渐衰颓的内在原因。这种建立在还原历史真相基础之上的分析,自然能够产生较强的说服力。

对思想容量和深度的追求,已经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如果说《大国商帮》将这一点推进到了一种极致状态,应该不会有人质疑。强烈的思辨性,成就了这部作品最为突出的文体特质。创作者鲜明的主体意识当然是最关键的,数十万字的篇幅,也为这种思辨的充分展开提供了开阔裕如的空间。在许多其他作品中,思想性的体现方式,通常是以一种已然成形的观念来解说、阐释、印证具体的现象,但在这部作品中,不独观念,连观念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受到关注。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层层诘问、相互对比,思辨的展开本身就呈现出一种独立自足的品格,使阅读成为一个思维激荡的过程。这当然会有助于读者深化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探究对于现实的启示意义,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作为以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为观照对象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此。当前备受全球瞩目的“一带一路”,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要实现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两大目标,都需要具备开拓、创新、进取的意识。这种精神曾经成就了历史上粤商群体的辉煌,也可以有效地转化为今天我们拥抱世界的精神资源。这未必是作者写作此书时的初衷,但二者之间显然具有内在逻辑的相通性。历史对于现实的映照和启发作用是真实的,也是以一种普遍联系的方式体现的。

## 以思想之光烛照粤商历史

□彭程

## 历史的一种新写法

□刘琼

粤商之于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许多人认同,但具体的重要性是什么,许多人都似是而非。《大国商帮》从题材和历史常识上,集中给我们补了一堂课。不仅如此,这本相当于历史教材的书籍的新写法很值得研究。

不管用什么样的标签来标注,《大国商帮》这本书都是一部关于粤商历史的大书,是文学对于历史文本书写的一种新的实践。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跟别的书有区别,区别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让杨黎光这样一个大家来写这样一本书?

与各种各样关于商帮文化包括粤商的文学书写完全不一样,《大国商帮》表达了一个叫杨黎光的知识分子眼中的粤商历史。这种历史写法是有意思的写法。历史有很多种写法,有局部和整体之分,有史家和私人之分。通过个体的写作,提供对于历史认知的各种具体经验,建构历史框架里的血肉枝节,目前,在整个世界对于历史的写法中,这种从个体出发看世间万物,是比较受大家欢迎和信赖的一种写法。我特别赞成李炳银老师的说法:《大国商帮》这本书引入了个体视角。一花一世界,说的就是个体和整体的关系。这是一个怎样的个体视角?每一个个体都是具体的,杨黎光的“具体”是什么?杨黎光的成长经历、受教育背景以及成年后的自我教育,都会凝结成杨黎光写作中的DNA。这些DNA在杨黎光的其他作品中已有充分的体现。这次用非虚构形式写粤商历史,这些DNA派上了更加直接的用场。

阅读,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攫取,也是一个对别人世界、对他人世界的攫取。我们读《大国商帮》,攫取的是杨黎光的历史认知,包括关于粤商的历史知识以及价值判断。杨黎光从徽商的大本营安徽来到粤商的大本营广东,在中国两个著名商帮文化里浸染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直接影响了这部书历史观察的“屏风”以及情感投射方式。杨黎光是安庆人,安庆是近代史上出思想大家的地方,所以杨黎光个人的成长背景,包括徽商文化,都构成了他写作粤商和商帮文化的认知背景。粤商历史,有鉴于它的特殊性——开放、持之以恒、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大国商帮》里的粤商历史是和中国大历史紧密相连的,这就是杨黎光的历史维度和历史表达,这也是一个人写史的好处,就是可以在硬邦邦的历史史料面前摆进个人研究成果,建立在个人对于历史的理性研究基础上的个性表达,使文本具有个性魅力。

他写商人,支撑点是历史和哲学,这也是他的擅长。商帮或商业文化,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杨黎光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作了深刻细致的研究。一方面,他广泛占有可信资料,包括各种来源的历史资料、第一手案例、丰富生动的细节,另一方面,他具有良好历史和哲学文化修养,他的眼睛是记录仪,也是独特的编辑机,同时是高智能的熔化炉。各种材料被杨黎光炼化的结果是,以粤商为具体和主要对象,在整个商帮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商业文化和政治、经济以至历史发展的关系的呈现,成为文本的核心表达。《大国商帮》围绕封闭和开放这样一个思辨性话题的书写,使这本书的格局一下子打开,具有了思想力量。写个体也好,写群体也好,重要的是写到行动,还写到行动的驱动力——思想,这与通常只关心历史事实描述的历史学家的写法迥然不同,《大国商帮》的文学性也在此。我们通过杨黎光的眼睛,看见了史料的消化,或者史料的编辑、剪切,以及消化后反刍出来的史识,这是特别重要的、有价值的。

《大国商帮》写出了面对各种历史转折或者社会局势变化的粤商群体的表现,这些自觉和不自觉的表现,影响了具体的粤商群体的前途,也影响了历史的前程。这就是杨黎光的历史观——世间万物都有具体的联系,责任是客观存在的,自觉的担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其次,杨黎光是优秀的小说家出身,他对人的把握以及对细节的嗜好是掩饰不住的。《大国商帮》把商人这个群体写得丰满、生动、可信。商人的主体是人,粤商跟徽商、晋商的差别有共通性,也有差别性,这些都写到了,但重点写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粤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闽南文化气质对于粤商的深层影响在情理之中,粤商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构成。在这样的前提下,这本史书在细节上、文学性上,都有特别丰富的表述。

写历史当然第一个要务还是要广泛占有资料,或者广泛征用细节,使历史更加丰满。这本书的时间轴如果能够往后延伸一点,写到粤商的近代史或者现当代史就更好了——不知杨黎光是否还有这样的书写计划。

# 《大国商帮》:杨黎光创作的新脚印

□李朝全

是杨黎光的一大创造与突破。

《大国商帮》是一部具有“冒犯”精神的书。首先,它究竟是不是一部报告文学?它事实上对传统的报告文学概念形成了一种背反或侵犯。传统上认为报告文学就是写人、记事、叙史、立传。但这部作品若定义为一部历史著作亦可成立,《大国商帮》写的是粤商发展历史。如若认为是一部思辨性著作也有道理,因为作者确有诸多独到的思想发现和阐述。这是一部思辨体或学术体报告文学。作者像做学术研究一样,参考引用了大量文献。作品的一个标签是“粤商发展史辨”,它是杂交的或跨界的一种写作,超越了文学,也超越了单纯的史著,突破了传统的报告文学的范畴,明显地构成了一种“冒犯”。其次,作品的冒犯性表现在思想观点的阐述上,其中有许多独到的发现,比如作者提出:辛亥革命归根到底也是一场商人的革命;粤商引领中国工商业不断追赶世界的脚步,成就了中国两大经济中心(上海和广州)的崛起……这些观点都振聋发聩。包括他提出:由粤商充当操盘手的洋务运动,让中国有了自己的铁路、矿

厂和轮船公司,由粤商经营的环球百货公司彻底改变了传统商品销售模式与消费概念,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使得现代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开放、创新、

进取是粤商的传统,也是粤商的特质……很多论点大家可能未必赞同,但杨黎光敢于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对传统的商业研究、历史研究的一种“冒犯”。

《大国商帮》抓住了几个坐标支点:一是抓住了商人与国运的关系。同时抓住了广东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海洋与陆地、沿海与内地的关联,包括抓住了粤商与晋商、徽商的对应关系。在这几个坐标支点上来考察粤商发展历史,这是本书很鲜明的一个特点。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一道清醒剂和营养剂。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最早的名作是《无极之路》,最近又写了一部《塘约道路》,他用报告文学在探讨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将来如何走向的问题。杨黎光写下“现代化三部曲”:在《中山路》里,中山路不只是一条条道路,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实业救国之路;到《横琴》这部作品,对珠海横琴这个改革样本进行5年的观察与思考,探究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路向;一直到今天的《大国商帮》,考察粤商发展脉络,实际上他所考察的也是一个道路的问题,或者说他是在探析中国在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上将来该如何走向,过去又是怎么走过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就是要思考中国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的问题。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一个宏观战略

的问题,由一个报告文学作者来完成,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大家的风度或气度,一般的作家也承担不起这样的思考。

《大国商帮》实际上探讨了中国如何从古代走向近代;《中山路》探讨的是中国如何从近代走向现代,《横琴》所要探讨的则是中国将如何从当代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30年走向后30年。作家考虑的问题比一般人深广,忧深思广。这个三部曲也构成了杨黎光写作新的三个、追寻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大国商帮》最早写到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南越国,一直到唐代专门给外国人设立番坊这样一个聚居区。到了明朝时出现了牙行和海商,到清朝则出现了十三行、行商、买办,一直到民国摩登时代出现了侨商,到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粤商继续领风气之先,这个脉络非常独特,而且这种书写也和常规报告文学不同,常规报告文学强调写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情,但杨黎光所写的历史内容却越来越遥远,延伸到了秦汉,这样一种写作也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刷新,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追求与抱负。作品中写到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数千年的粤商发展历程,作者用一本书、用具有文学性的形象的文笔将其写出来,这需要高超的才力和驾驭能力。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重要突破。